

## 112年度台上大字第840號裁定不同意見書

法官沈方維提出、法官彭昭芬加入

1. 法律之解釋具有多面向，解釋方法並無當然之優先次序，應以務實角度作為終審法院法官於解釋法律時之準據，以提高司法溝通之說服力。
2. 一般而言，傳統意義之民事法律，旨在調整平等主體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強調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，故解釋時須考量當事人之真意及契約目的，以符合社會生活實況。惟當民事法律亦被賦與社會公益作用，於解釋法律時，即應另加重社會意識之分量，祇須不違反法條文義之可能或可預測範圍，皆為適法之解釋。
3. 為保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，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，而有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（下稱投保法）之訂頒，規定以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（第5條參照），並賦與其辦理法定業務，於發現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特定違規情事，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，享有介入公司治理監督之特定職權，自屬具有公益作用之立法，而非單純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調整，於為法律解釋適用時，不宜一仍舊慣，僅以調整平等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解釋原則為準據，而應更側重於貫徹立法意旨之目的解釋。
4. 訴之利益，又稱為權利保護必要。原告就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爭議提起民事訴訟，不需事先徵得被告同意，即可強制被告應訴，並請求法院加以審判，乃國家司法權之作用。而為避免被告及法院之勞費無益付出，乃以原告就該事件具有權利保護必要（即訴之利益），始得認其起訴具備訴訟要件而合法，以避免原告濫訴。另當事人適格，指當事人就成為訴訟標的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，即享有訴訟實施（遂行）權，與訴之利益同屬訴訟要件。於依個案情節判斷，就訴訟裁判之特定事項可受肯認具訴之利益時，該事項即可認

具對象適格，無須就此適格存否另加審認，意即當事人適格之判斷，被吸收於訴之利益之判斷中。

5.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之職權，其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之任期內發生者為限，依該條立法目的，即：「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，外界建議保護機構應該為維護股東權益，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、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，進行相關措施，以保障股東權益」可知，由保護機構行使解任訴訟權，其訴訟目的係將有違法失職行為之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或監察人，排除於該公司經營者之外，以維護公益。
6.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失格效力之規定，立法理由在於：「公司是否誠正經營、市場是否穩定健全，除影響廣大投資人權益外，更牽動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秩序之安定」、「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」、「為維護公益，確保公司及其股東權益，並達成解任訴訟之立法意旨，增訂第七項」。應認該項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且屬立法形成自由，並附隨於第1項第2款之法院判決解任宣告而發生，難認第7項規定係第1項第2款規定之要件，故應否發生失格效力，尚非法院受理解任訴訟時之審判標的，更非法院判決主文應予宣示者。再參酌第7項立法理由：「又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，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，未擔任該職務時，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，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」，係表明：「於訴訟繫屬中，『未擔任』該職務時」，並非「於訴訟繫屬中，『已卸任』該職務時」，該立法理由之說明，解釋上可包括「起訴後未擔任」及「起訴前即未擔任」之二種情形，益見立法者就第1項第2款規定解任訴訟之對象，並無以仍在任期中之董事或監察人為限之原意。
7. 再者，倘保護機構提起之解任訴訟，經法院認定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（即被告董事或監察人在任期內有違法失職行為），法院即應以判決主文宣示：「被告○○○擔任被告◎◎◎公司之董事（或監察人）職務，應予解任」。於判決確定時，被告○○○

○如仍為被告○○○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不論與起訴時是否同一任期，均發生解任當下任期之形成效。如已非被告○○○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，不論起訴前即已不在任或於起訴後始卸任，均因無任可解，無從發生變動現在法律關係之效力，就此而言，固屬徒勞；然立法者既欲藉法院審判程序，於確定被告有違法失職行為後，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賦與失格效力，並依第8項為解任登記，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，審判機關於法律適用時，自應予以尊重。否則，有違法失職行為之董事或監察人，可在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、保護機構啟動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前，以辭任方式逃避失格效規定之適用，已有鼓勵脫法行為之虞；況且，同屬於法院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已無任可解之情形，起訴時仍在任者有訴之利益，即具當事人適格，而起訴前已不在任者無訴之利益，不具當事人適格，有何可區別對待之正當法理基礎？尚待澄清及說明。

8. 法院就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之解任訴訟，僅審判被告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期間有無違法失職行為，不涉失格效之宣示。被告之所以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，並非源自法院裁判之宣告，而係依法律規定，實不能認係法院之裁判影響被告工作權，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二者係不同層次問題，不容混淆。何況，違法失職在先，僅3年內不得擔任董事或監察人，期間有限，且尚有其他諸多工作可以從事，亦因符合憲法第23條之除外規定，而無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之虞。
9. 綜上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就「起訴時已卸任」部分，既無排除之明文，第7項立法理由亦以「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」為說明，未排除起訴前已卸任之情形。則基於目的解釋所得出之肯定說，既未超越本條項文義之可能範圍或預測可能性，又符合維護公益之立法目的，自較可採。
10. 法治是民主的基礎，而司法又是推行法治的首要，司法制度是否健全完善，攸關國家民主法治的前途。裁判應依民意表現的法律為依據；解釋法律，不能抱守法條字句之文義，應

進一步運用目的法學的方法，從有利大眾國民的角度，探求立法意旨與精神而為之。在當前立法有其侷限性之現實下，作為解釋適用法律終審機關之最高法院，如能針對新興社會紛爭事件，在現行法可得解釋範圍內，於充分說理後，作出有別於針對傳統事件見解之解釋，使法律條文發揮生命力，正是「審判是一種不易被輕易取代的專業工作」之體現，也是值得法律實務工作者追求之最高境界。倘無此項覺察，純以過往思維為解釋適用法律基礎，忽略法與時轉之精義，即忽略人類具創造性之特質，則審判工作終將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一天！